

變幻的坐標與漂浮的歷史

——廈門華僑的聚落研究¹

◎ 梅青

前言

在「九州方圓」的傳統地域坐標中，廈門在中國的歷史版圖上，無法擺脫蠻夷之地的稱呼。在「士農工商」的封建階梯上，農、工、商一直都是官僚紳士的陪襯。特定的地理環境，經濟因素和政治氣氛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華僑。

華僑在廈門的建築包括別墅、祠堂、學校、銀行、百貨公司和市場。這些建築形成了有別於本土的華僑聚落，呈現給城市以獨特的景觀。這些既作為文化載體，又作為文化符號的建築與聚落，附庸於華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究竟是何種因素影響了這些華僑對於賴以生存的建築及城市產生如此的場所感，以及由此形成的華僑建築與環境呢？

從清末到二十世紀初的這段時間裏，很多東南亞的華僑在故居地廣東和福建重建家園。廈門華僑的建築與聚落所展現出來的建築現象，是他們的世界觀，他們對於建築的態度與理解，建造方法與文化認同的反映。這些呈現出來的現象，也是吸引我們去追根溯源的根本動因。鑒於此，這篇論文將探討三個層面的問題：（1）華僑家庭結構原型；（2）華僑家庭結構和社會生活與禮儀行為的轉變；（3）二十世紀初華僑在廈門的建築。

一 原型、文化與傳統

現存較為可信的族譜顯示，80%的福建人於西晉（265-316）永嘉五年由河南光州固始縣移入福建²。唐朝末年（618-907），王潮和他的兄弟王審知因不滿於當時的狀況，為了建立一個新的領地和政權，帶領官民由固始縣輾轉來到福建。當時的福建是一個人煙稀少的地方，每平方公里僅有一人。在群山環抱之中，王氏兄弟首先於光啟二年（886）佔據了泉州，之後佔據了閩南的大片領域，建立了「王氏政權」，從此開始了閩國的歷史。它是中國南方唯一一個完全由漢人建立的國土。閩南由此而得名，並一直沿用至今。³遷徙而來的移民在閩南有兩個最為特殊的習性：（1）聚族而居；（2）祭祀祖先。這兩種傳統的生活方式反映在他們佔族田，建宗廟的建築活動中。儒家傳統長久以來統治著人們的思想並支配著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社會以家庭為基本單元的形式，物化地反映在傳統的住宅類型以及城市布局方面。

費孝通對於中國家庭結構的研究，為我們展現了四種家庭模式，其中之一為「擴大的家庭」

模式，華僑的家庭結構與此頗為相似。這種家庭由核心家庭與分枝家庭組成，包括親戚，有時包括不甚相關的人。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調查福建、廣東等中國東南省份的家族體系，在結構和功能分析上做出貢獻，發展了這種家庭模式的研究。他假定典型的家庭每一代自成一個循環⁴。他研究中國東南部家庭和宗族體系的方法，更進一步從上述地區的實地考察中，獲得了支持和證實。基於此，學者們以田野調查和更為實際的方式重新審視中國的「家庭」。謝繼昌對此提出了一個多層操作的概念，他將中國家庭看成是一個由一群享有共同血緣關係，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成員所組成的經濟單元。成員及其後裔都享有共同的權利和義務⁵。在這樣一個「家庭」、「家族」和「宗族」的脈絡上，延伸了中國家庭的概念。這一家庭網絡甚至包括所有那些享有共同姓氏的人。更進一步地，弗里德曼將中國家庭結構的研究從南中國延伸到東南亞，他研究了南洋華人的血緣關係體系、宗族體系和各類社團，以及華人婚喪嫁娶，祖先崇拜與信仰等有關的儀式行為⁶。

二 華僑的由來與轉變

唐宋盛世，從中國沿海一帶去東南亞各國經商的人，並未被認為是永久地離開了中國。即使一些華人沒有返回，他們依然被認為是「住蕃」而依然被認同是中國人。從閩南外出的貿易者，完全依賴於季風模式在外停留一季，一年或者更長的時間。

清代謝清高（1765–1821）的《海錄》，記載了他遊歷東南亞國家的所見所聞。他18歲時隨番舶出洋成為海員，從乾隆至道光元年，他的足跡遍及暹羅（泰國）、新加坡及與東南亞有關的西方國家。他口述十八世紀晚期東南亞華僑及當地土著從事種植、開採及貿易的生活，翔實具體⁷。而出生於福建龍溪（今龍海）的王大海，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泛海至爪哇，後居住在三寶壟。他的《海島逸志》更確切地記錄和反映了他在爪哇居住期間的所見所聞及當地華僑家庭生活的典型實例，其中反映了華僑生活方式的一個方面：「漳州東門外深青社有蘇某者，經商西洋，娶婦某氏，數載以不獲利而歸，遂卒於家。西洋婦聞其訃，且知其家貧，親老子幼，乃孑然帆海以歸夫家，奉養老母，克盡孝道，教子成人……」。⁸從這記載來看，華僑的家庭結構在更大的程度上延續了他們家鄉的家庭原型。

然而，風雲變幻的政治經濟氣候，在異域他鄉創業的艱難，改變了華人的生活。王賡武在談及華人在南洋的發展變化時寫到，無論同化與否，海外華人的確是變化了。他們在各個方面都表現了極強的適應性，同化於當地的文化與習俗⁹。這一事實便本質上修正了「華人」的歷史坐標。

華僑們是如何適應所居國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環境的呢？帶著這個問題，筆者分別在1997、1998和2000年的三次東南亞之行中，採訪居住在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華人。他們的祖父輩和父輩分別在晚清離開閩南而移居東南亞。從這些口頭採訪的記錄中，不難看出，在甚麼方面，這些華僑在對待外國文化和本土傳統的態度上發生了變化。由於教育背景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在宗教信仰、語言、飲食起居及日常生活方面，他們的文化傾向和行為都發生了變化。

案例1：這所房子是一個第二代移民的住宅。第一代於清朝末年自福建遷徙檳城。他們來自福建的大宗，在福建故鄉擁有房產和田地直到50年代。他們在檳城開始以店屋生意起家，發展到第二代時已經可以擁有自己的公司，並從店屋遷入從前外國人居住過的洋式別墅。從這個

居住在別墅的家庭裏，培養出接受西方教育和職業訓練的建築師、醫生以及三個嫁到外國去的女兒。在西式的別墅客廳裏，中式的家具陳設和陳列著的家庭歷史舊照片顯示給我們這個家庭的華僑身份。

案例2：這座店屋坐落在檳城一條比較安靜的街道，居住着一個由馬來人與一位華人婦女組成的家庭。採訪他們之前，這裏的華人朋友就以一種新聞的方式告訴我，這位出身富族的華人女子與一位馬來男子結了婚。她的祖父清末從閩南的海澄移居檳城。今天，這個家族在城市中依然擁有紀念性的建築，以及由住宅環繞的廣場和大量的城市土地。

她的房子是一座兩層的店屋。在1990年代由這對夫婦買下來並進行了翻修。據說，這間房屋曾被用作1909年至1911年的東南亞同盟會的基地。孫中山旅居東南亞期間曾經以此為根據地，籌劃推翻滿清帝國並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準備工作。店屋的首層作為這個家庭的客廳、起居空間、書店及辦公室；第二層是一個較為私密的空間，用作臥室。十分具有馬來傳統意味的是將整層地面作為床鋪。

案例3：印度尼西亞的第二大城市泗水，是華人比例很高的城市。接受採訪的這戶人家是華人後裔的第三代。這對夫婦均在印尼接受高等教育。今天，他們是泗水兩所大學的教師。他們既不能聽，也不能說和讀華文。然而，他們還是熱情地安排了與她父親的短暫會面。這位老者居住在這個城市裏。他經常騎自行車來看望他女兒一家。50年代，他曾經在小學教授華文，雖然華語遭禁30年之久，他還可以用華語交談。年過70的他看上去面色紅潤且身強體壯。他回憶他的父母從福建漳州的某個村莊來到印尼的經過：「……在這裏物質生活很好，但在精神上依然無法擺脫思鄉之情。我與女兒在90年代一起遊覽北京，她的一個遠房姨媽住在那裏。我真不能相信，中國發生的變化與我的想象全然不同。我們住在那間四合院裏，體驗著街坊鄰里的嘈雜擁擠的日常生活。由於旅行團的緣故，所以我未能到福建的家鄉看一看。……泗水這裏終於平靜了，但誰知道明日會發生甚麼？我們與他們沒有往來，他們真是野蠻。」這家人正在盡力為三個十幾歲少年的前途而申請去美國生活。到時，他們三兄弟會分別接受美國的大學教育。

華僑不但在居住方面有了適應性的轉變，而且在飲食習慣上也有所變化。在一次中午的聚餐中，我們來到檳城有名的由海峽僑生所開的餐館。這間餐廳具有「垵垵娘惹」裝飾細部。在這裏海峽僑生有一個特殊的稱呼，稱男性為「垵垵」，女性為「娘惹」。早期的華人貿易者在城區中有很多機會與馬來女性接觸，與馬來人通婚在與其他類型的婚姻相比具有優越性。他們的後裔也為「垵垵」或「娘惹」的身份而具有優越感，因為他們既可以在馬來人的社團中，亦可以在華人的社團中享有更多利益和機會。

海峽華人的清明祭祖是每年必行的儀式。這種活動經常以家族的形式進行，有時也由家族之間合作舉行。1998年謝氏族人在家族墓地組織清明祭祖。之前一天，他們準備好燒烤的乳豬，各種蔬菜水果及熟食，以及大量的紙錢，在清明節的早晨，聚集在墓地前為祭祖而建的大堂裏。信理員致辭之後，他們在祖宗陵前分發預備好的食物，燒紙錢，唱哀歌。

從1890年代到1911年的這個時間段裏，華僑經歷了一個重要的轉變時期。一些遊歷國外的航海家、旅行家和外交使節所撰寫的遊記和回憶錄，引起清代對華僑問題的關注。清末外交家和官員出訪東南亞，以及在由清朝政府派往海外的外交使節所發表的演說致辭中，使用了「華僑」這一詞語，這使得「僑」具備正式的身份及受到官方的認可和保護。

清朝光緒年間，廈門華僑通過捐錢買官而獲得了較高的地位。清政府用華僑的捐獻加強軍備

及增加管理方面的開支。祖籍同安的新加坡華僑陳泰，清朝末年捐官成為「中憲大夫」、「通奉大夫」。他的「合春號」木材行也從新加坡遷往上海。像陳泰一樣，23歲時從同安去了爪哇的黃志信（1835–1901），也在清光緒七年（1881）的時候，因在印尼的三寶壟制糖業績，捐官為「中憲大夫」。1890年，他將設於三寶壟的「建源公司」的業務轉給兒子——著名華僑黃仲涵，回到故鄉廈門。此外，還有很多華僑從清政府捐買官銜，如陳謙善買得了「光祿大夫」；邱正忠和他的兒子邱菽園買了如此多的官銜，如「花翎鹽運使」、「光祿大夫」、「道台」等等。除滿清給予的身份和地位的吸引外，華僑的家族及宗族是另一個吸引他們回到故鄉的重要因素。他們大多數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泰國歸來，也有的來自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三 二十世紀初期廈門華僑建築

在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時期，華僑為推翻清朝統治貢獻力量。他們被孫中山譽為「革命之母」。孫中山擔任南京臨時大總統期間，在上議院為華僑留下了六個名額。這些華僑既被尊為「愛國華僑」又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他號召華僑為國貢獻力量，以他對於中國之理想感染着海外僑胞。1921年，孫中山為現代中國發展，著書提出若干主張。他理想中國際都市的模式是應該具備鐵路與高速公路，充沛的水資源和灌溉，新的口岸和現代城市，基本的工業和公共設施等等。他堅持重建及經濟發展並重的政策，並提出二十世紀中國城市的重點在首先發展住宅：「四萬萬同胞中，窮人還住在茅屋及窯洞之中；中等或富人住在廟宇中。舊中國房屋往往首要考慮的是祖先的位置，它必須放在房屋的中央，而其他部分必須居於從屬的地位。房屋的建造似乎不是為居住的舒適而是為了儀式要求。房屋在民族的文明進程中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比食物和衣著更能帶給人欣喜和快樂。」¹⁰對於房屋作為一種工業來看，詳細的闡釋表現在如下的四個方面：（1）建築材料的生產及運輸（磚、瓦、木材、鐵構件、石頭、水泥等）；（2）房屋的建造；（3）家具的制造；（4）房屋設備的供給（水、光、熱燃料和電訊等）。孫科（1891–1973）在1921年任廣州市第一任市長時，為支持這一觀點，提出了著名的「都市規劃論」。他進一步重申：「都市規劃包括一個城市建設的方方面面：城市的路網，商業系統，公園和娛樂場所的位置，公共設施的配置，城市上下水道的設置，工廠和房屋的建造，等等」¹⁰。為滿足新的管理辦法和機構需要，舊的衙門廢除並拆毀了，取而代之的是市政和署的建制。更為具體地體現在，舊的城牆被拆除了，街道被拓直、加寬並重新鋪築了，百貨商店建來取代了市場，其他公共建築如戲院、電影院、咖啡館、舞廳和旅館也建起來了；公園、廣場及運動場也興建起來了。這些建築實踐將廣州推進一個現代都市的行列，並且成為其他城市的範本。與此同時，內陸城市如南京和成都同樣經歷著城市再建和改造的階段。城市更加受到來自從西方受教育回來的人士開明思想的影響以及權威人士的影響。城市建設者既注重規劃中尋求新秩序，同時側重於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在此時間的上海，當二十世紀初期早以躋入現代城市的行列時，也經歷了社會生活和習俗，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以及城市認同感的變化。這些變化及活動主要是通過政治家和各個城市新成立的市政委員會所領導。這些委員會的成員，大多是在西方國家受過教育的規劃人士與管理者，他們試圖將中國的城市建設得更為現代化。在這個時間裏，也有一些西方的建築師和學者們被邀請來參加城市規劃與建築設計，協助中國興建城市。^{11 12}

1919年，廈門以林爾嘉為主席，以黃奕住為副主席組成了市政會，由29名成員組成。林爾嘉，又名林菽莊，祖籍福建龍溪。他的家族在清代乾隆年間在台灣發展成為富裕的家族。1895年台灣被迫割讓給日本後，林氏家族回到廈門並定居鼓浪嶼。此時，黃奕住剛剛從

東南亞歸來。林、黃兩位一拍即合，立即一同與當地人士組織了委員會，召集海外華僑投資廈門。在此基礎上又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稱為「市政局」，在1921年由周醒南掛帥。¹³

周醒南本是廣東惠陽人。他以教師身份移居新加坡之前，負責廣東省的公路建設。1916年，他自新加坡回到廣州，培訓當地的建築工匠。1917年，應陳炯明之命，他負責廣東城市建設。1920年，他負責廣東惠平公路的建設；1921年，負責泉州公務局的工作；1924年，應廈門海軍司令林國慶之邀，周醒南組織閩南工匠建設海堤，廈門港及公共設施。1919到1926年期間，廈門城市經歷了第一次設施、道路及建築的重建新建。由委員會領導的第一個舉措是拓寬自清康熙23年（1684）所建成的街道。那一年，廈門解除了海禁，由此激發了海外貿易的發展。城市也開始興建街道了。最寬的一條是衙口街，從提督牙延伸至城市的南門。另外還有25條街道。其中五條被稱為「內街」因為它們靠近內城。另外有16條街被稱為「外街」，因為它們靠近海。所有這些街道都是三米寬度。

從1919年到1926年，是華僑投資建設廈門城市的第一個階段。通過與當地的精英人士合作組成委員會，而致力於重建廈門城市的工作。首先，他們認識到現存城市道路局面的弱點在於不能滿足變化時期的需求。委員會組織當地工人拆除城牆，拓寬道路和街道。開元路是第一條廈門鋪築的街道，意味著開始一個新的時代。路面以麥卡登式鋪築，街道兩側將商業建築與居住建築混合成為店屋形式的建築。同時，廈禾路、大同路、中山路、思明路、鷺江道，都在1920年到1926年這段時間內建成。沿路的建築控制在三到四層。店屋建成騎樓形式。中山路和思明路兩側每座建築的高度和風格，雖然出自不同的業主，然而彼此影響，相互學習和模仿。

孫中山先生於建國方略中，論及廈門港問題，謂：「吾意須於此海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以為江西福建南部豐富礦區之一出口，此港施以新式設備，使能聯陸海兩面之運輸以為一氣。」所謂海面之西方，即嵩嶼也。到了1936年，已經形成了一個有著合理組織，並順應自然地形的道路系統的濱海城市。從漳州到石碼的高速公路興建起來了。華僑與本地精英的合作，產生了一個城外新區的規劃，也就是嵩嶼規劃。這是一個有著完整的街道體系、市政設施和街坊的區域。嵩嶼地位之優越，已如前述；在思明市政籌備處會刊中，將它對於廈門的重要性與九龍對於香港的重要性相比：「蓋鑒於廈門政治與經濟之建設，既受國際條約所拘束，不獲自動伸展，自應另闢市場，以裕民生，用意至為深遠……。目今歐西各國工廠，因都市中心——地價、勞力均極高昂，多謀向外遷移。廖以嵩嶼與工業區域，尤適合於此種趨勢也。」¹⁴此時，基礎設施如港口、自來水公司、電話公司、電力公司、市場和其他公共建築都興建作為城市的基礎設施。

中山路和思明路是由華僑在上個世紀的二十年代建造的。沿街店屋主要是騎樓式形式，即店屋的首層退後「五英尺」以形成人行道。在閩南話中，這種人行道發音為「五腳基」。實際上，它反映了閩南方言借自於東南亞的馬來語和印尼語的一個過程。例如，五的發音來自閩南，而腳基的發音則來自於馬來和印尼語。這種語言現象暗示騎樓起源的一個方面，即騎樓式建築是由東南亞華僑介紹到廈門的一種建築形式。

萊弗士（Stamford Raffles）在1819年新加坡開埠以後，建立了一套嚴格的管理辦法及詳細的城市規劃原則。更確切地說，他制定了「五英尺」來嚴格界劃新加坡沿街的店屋。這種方法也可見於荷屬印度尼西亞的城市和英屬馬來西亞的怡寶和檳城¹⁵。新加坡學者Jon Lim對於檳城和新加坡的店屋的研究，將這種建築歷史地溯源到南宋時杭州等地的沿街建築。他堅持

這是「基本上的中國民間的建築形式適應於殖民地文脈的一種情況」。新近的關於印度尼西亞店屋起源的研究，支持這種觀點，「印度尼西亞的店屋與在印尼島國的華人聚落歷史緊密相連。很多移民來自於南中國。是這一地區的建築為在印度尼西亞的華人店屋提供了主要形式影響。建築的各元素設計來抗拒潮濕的亞熱帶雨林氣候及台風，強光等氣候，傳統的南中國建築很好地適應了印度尼西亞的這些氣候。」¹⁷

1904年，廈門在原有行會的基礎上成立了總商會。從1905年到1920年，民主政治家激發的民族熱情，使得廈門城市經歷了發展改革和城市復興的階段以迎接新世紀的到來。這些華僑從國外輸入了建造材料以進行城市的翻新。他們投資建設城市道路，街道，建立公共服務設施並投資房地產。1921年，黃奕住被選為廈門總商會的主席。他在香港和上海都建立了各種公司，並建立了中南銀行，這所銀行在廈門發展華僑貿易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還有其他著名華僑人物，如黃文華，黃秀拊，黃仲訓，李清泉，黃念憶，楊忠信，林文慶，陳嘉庚等，在各種委員會中擔任職務。廈門島上的土地也提供給他們興建住宅，公共建築及各類機構。

第一個階段是為他們「擴大的家庭」興建住宅，包括由家族，宗族及不同家族之間通婚而組成的成員居住。除了家庭生活之外，這種住宅也用作「家庭機構」，這後來發展成為更大的社會組織機構。投資各個機構是華僑另一種典型活動。主要的機構類型是由家庭或家庭之間的合作形成的。那時廈門有大約300家公司。從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到1938年的時間裏，廈門就有2145家華僑家族企業經營房屋和地產生意，當中，黃奕住家族與李昭北及其兒子李清泉家族是處於領先地位的。

1918年，黃奕住從原來的英國商人的產業「德記洋行」買下了鼓浪嶼洋人球埔，在此建築中建立了他自己的家族企業「黃聚德堂」。在他回廈門以前，他在印度尼西亞的三寶壟已經建立了家庭企業「日興行」。當他1919年回到廈門之後，延續了這種家庭機構，更名為「黃聚德堂」。在開創階段，他組織了四個成員一同形成了一個委員會，這四個成員是他的兩個兒子，一個女婿以及一個非家庭成員。1919年後，他開始吸引人才到他的家庭機構中來。林全成工程師來自於廈門的自來水公司，與經理周幼梅一起加入了黃奕住的「黃聚德堂」。在接下來的日子裏，這間「黃聚德堂」所建立的網絡遍及廈門、上海、天津、漢口、南京、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業務領域包括房地產及基礎公共設施。1920年，黃奕住興建「觀海別墅」。之後，他投資港口並興建了一條商業街——「日興街」。20年代的廈門，僅「黃聚德堂」就擁有160座建築，佔41000平方米。此外，他與林爾嘉一起在1922年投資興建了電話公司。

1920年從菲律賓歸來的李清泉和其叔父李昭北一同組織了自己的公司，主要沿著中山路和鼓浪嶼的升旗山興建房屋。在大同路和鎮邦路上由他們興建的房屋都是三到四層的店屋。其他華僑也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公司。「黃榮遠堂」擁有54座房屋，佔17000平方米；「升龍」興建了52座房屋，佔13000平方米；「榮昌」建了24座房屋佔13000平方米。鼓浪嶼有1000多座華僑興建的住宅。這些地塊由華僑和當地人士所組成的委員會決定和分配。華僑可以從委員會買得土地。很多華僑從海外帶來舊墅圖紙，甚至從他們的旅居國家運進建築材料。在1910年到1930年的這段時間裏，在眾多的廈門華僑建築中，主要的三種類型建築猶具特色，分別為坐落於鼓浪嶼的別墅建築，坐落於廈門市區的學校建築和沿街的騎樓商業建築。

廈門城市的發展展現給我們一個口岸城市如何發展成為二十世紀初葉現代城市的過程。廈門華僑特殊的經歷，他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生活，以及他們跨國界，跨文化的視野，為廈門的

城市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這在他們的建築與聚落環境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註釋

- 1 本文為在杭州召開的第二屆中國建築史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陳志明教授所給予的幫助。
- 2 這些族譜包括：（1）明代王琨修，王國楨等續修，今傳世有清光緒六年刻本〈開閩忠懿王氏族譜〉，王秀南纂，新加坡刊本〈王氏立姓開族百世譜〉和〈王氏重修族譜〉，也有來自碑文的族譜資料，如錢昱，〈忠懿王廟碑文〉，于競，〈瑯琊王德政碑〉及翁承贊，〈閩王審知墓志〉。
- 3 徐曉望：《閩國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
- 4 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6).
- 5 Hsieh Jih-cha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Chinese fam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rural village" in Li Yih-yuan and Chiao Chian eds., *China's People, Society and Culture* (Taipei: Shih-huo, 1981), p. 65.
- 6 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57).
- 7 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受，馮承鈞注釋：《海錄注》（北京：中華書局，1955）。
- 8 王大海著，姚楠、吳琅璇校註：《海島逸志》（香港：學津書店，1992）。
- 9 Gungwu Wang (王賡武),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0 Yat-sen Sun (孫逸仙),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Chungking: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3), p. 22.
- 11 孫科：〈都市規劃論〉，《廣州市市政報告會刊》，1924年。
- 12 關於從清末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城市與建築所經歷的變化，見王紹周：〈從1840年到1949年中國近代建築概覽〉，《華中建築》，1987年第2期，頁8-13；Joseph W. Esherick ed.,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Kristin Eileen Stapleton, *Civilizing Chengdu: Chinese Urban Reform, 1895-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Hanchao Lu,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13 參見*Far Eastern Review*, XXVIII, no.11 (Nov.1932), p. 526.
- 14 摘錄於廈門市圖書館藏《思明市政籌備匯刊》（未發表）。
- 15 Robert K. Home, *Of planting and planning: the making of British colonial cities* (London : E & FN Spon, 1997), pp.118-140.
- 16 J. S. H. Lim, "The 'Shophouse Rafflesia': An Outline of its Malaysian Pedigree and its Subsequent Diffusion in Asia", *JMBRAS*, 66 (Part 1), 1993, pp. 47-67.
- 17 *Indonesia Heritage* Vol.6: Architecture. Archipelago Press, 1998, p.114.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六期（2002年9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